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0.06.025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

——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陈 琴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关键词]“底层小说”;身份认同;爱情叙事;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0)06-0137-05

新世纪的文坛上出现了关注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人格尊严和生存价值的作品,并形成创作和评论的潮流,学界将这些文学作品命名为“底层文学”。在解构经典、消解意义的精神广泛渗透进文艺的时代,“底层文学”的出现以其承担现实、直面苦难的勇气给人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作家在创作“底层文学”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把握当代社会状况、揭露现实沉疴的动机,因而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表示,“中国的土地最多需要1.8亿劳动力,而现在有3.4亿农民,那么其余1.6亿的农村人口则需要通过进城务工的形式来消化。”从新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怀揣对城市的向往和对生活的期盼进入城市,在城乡的缝隙中漂泊着找寻自己的位置。但面对这样一个群体,城市在体制上和思想上都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他们消化城市里最脏、最累的活,面临着住房、婚姻和医保的压力。有形的物质压力、无形的社会歧视给他们的生存背景涂抹上些许暗色。城市的浮光掠影,铺天盖地的广告对人们进行现代意识形态的轰炸,当农村成为被现代性照耀不到的古老、落后的暗角时,这些两栖于城乡边缘的打工者正经受着市民化的阵痛。

“底层文学”从新世纪发展至今,题材、风格日

趋多样化。小说中的底层人群一方面作为作家实现社会批判的“素材”,另一方面又作为审美观被建构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底层小说”一方面继承了从五四时期业已开始的铺叙苦难的题材(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鲁迅的《祥林嫂》);另一方面,对底层主人公内心的探索的题材也在不断地丰富着。对底层人群生存环境的书写往往给人新闻式的震撼,但也容易走入创作平面化、表象化的瓶颈,许多作家与评论者都注意到这个问题,因而解读主人公心灵内涵的作品在近几年逐渐增多。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为表述这一历史的“新群体”的思想状况提供一个文学的维度,同时也拓宽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领域。本文以“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为中心,来考察“底层小说”反映出底层人群的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

一、身份认同与焦虑

中国现在有1.3亿的打工者,占总人口的12.5%。谁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物质、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成为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指标。日本的无产阶级小说《蟹工船》作为地下文学悄然流行之际,世界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而在近几年这部小说在日本掀起空前

* [收稿日期]2010-10-17

[作者简介]陈琴(1988—),女,福建福州人;硕士研究生,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学习,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的阅读浪潮,世界范围再次爆发了自2008年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不禁使人想起周扬在《现实的与浪漫的》中的论断:“艺术的概括有时简直是一种‘预见’。作者由现实摄取隐秘的未发展的或在胚芽中的片段,在人们还没觉察到的时候,就用夸张的形式指给他们看,于是那一片段的本质就更典型,更明显了。”^[1]面对贫富分化逐渐加剧的现状,国家也针对“第二代农民问题”,在2010年中央1号文件中作出了政策呼应。而在此之前,许多“底层小说”已经以其作者鲜明的时代感和敏锐的观察力表述或是代言了新生代农民进入城市后的思想动荡。从内容上看,“底层小说”的叙事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事之间隐含了一种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常常体现为主人公自我认同危机或是在“底层小说”中较为普遍存在的苦难叙事。这种危机既是作家现代性焦虑情绪的投射,也是写作者为底层代言的情绪表达。苦难、焦虑不再像《陈奂生进城》或是传统乡土文学一样只要诉诸个人思想觉悟的提高或是现代化发展便可以消解,而是源于作家内心深处的现代性焦虑的压抑性表露。无论是底层身份还是知识分子身份的写作者都怅然地发现,现代化所许诺的生活水平、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于大多数底层人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知识分子的良知促使他们去关注、去为一个在现代阴影下失语的弱势群体发言,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对现代性本身以及体制内片面追求现代化的质问。“底层小说”中,主人公对于城市有着不无复杂的情绪:“那么,有了垃圾,我们就能存活下去,垃圾越来越多,我们生活的质量就会提高。我们是垃圾的派生物。”^[2]“这厂子里是危险和恐怖的,到处是吃人的王水和咬人的电锯、冲床。拿着原料从仓库到冲床车间,或是从冲床车间到镀铬车间,就像是经过一片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3]“(老家充满着疾病、贫穷和伤痛)所以大家才想到城里来撞大运。”^[4]

在城乡之间,现代思想和传统道德、对现代性的期待与失落等等相互碰撞,显现出文化反思的力度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城市与乡村本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取向,但在几乎已被发展至上主义、精英崇拜制度“统治”的城市将这种文明向乡村大范围“输出”之时,一种思想上的平衡被打破了。依照阿兰·德波顿关于“精英崇拜制度”的阐述,在精英崇拜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认为“社会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自身素质”,^[5]但

当底层人群进入这个格局的时候,他们的出身、经济以及社会地位的局限使他们无法对自己以及他人回答:为什么自己富有能力和才干,却仍摆脱不了贫困的际遇。“底层小说”的主人公们离开乡村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主动参与或是被席卷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分子,城市的现代性甚至已经参与了个体的自我认同的塑造。如贾平凹的《高兴》中的刘高兴把肾移植到西安作为自己城里人身份的“确证”;张伟明的《对了,我是打工仔》中因为自己的打工仔身份在自我认同上的自卑感;夏天敏《接吻长安街》中通过主人公把打工者们对于城市的心态很好地表达了出来:“(城市)它离间了我和乡村的关系,像一只无形的针管,毫无知觉地抽干了我乡村的绿色血液,注入了城市的热烈躁动的红色血液,城市真是一个魔鬼,它连你的灵魂、你的血液、你的骨髓也能悄悄换去,但它换去你的灵魂、你的血液和骨髓之后又不接纳你,你是乡村的叛逆是城市的弃儿呵。”主人公通过在长安街上的接吻“仪式”来求得在精神上与城里人达到某些方面的一致。中国古代文明是注重仪式的文明,无论是过年祭灶仪式而达到人神沟通,还是通过男女交合仪式对于谷物丰盛、牛羊多产的相似性模拟,都是通过进行仪式来将物从此岸引渡到彼岸(比如通过烧纸钱,将纸从人世传递给阴间)。底层人暂时无法通过经济、社会地位达到与城里人齐头并驾的地步,而只能通过这种充满仪式感的接吻来获得自我城市化的精神认同。成为城市的一员——这对于“城市人”如此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对于民工们却需要在克服肉体上、精神上的重重困难后,还郑重地包了一辆面的,穿西装、打领带来实现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群体行为。在这个行为之后,这些民工们将在心理上把自己引渡成为城市的一员——难与易、可笑和可悲碰撞在一起形成让人难以忘怀的“含泪的笑”。与此相近的还有刘庆邦的《不是插曲》,矿工通过莫须有的“讨厌吹口哨”而拥有心灵的“权威感”,《血劲》中矿工把四真和秤锤视为代表着背叛矿工和侮辱矿工的敌对力量,而把他们杀死。刘高兴把肾移植到城市当成自己是城市人的重要证据。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上文中提到的“仪式”还是“权威感”或是“重要证据”,都具有一种精神上的虚幻性。处于社会底层,被“上层人”轻视,欺辱的生存体验使得他们更为敏感,更加渴求生命的尊严感。正因为尊严的难以获得,他们才通过“仪式”、“代表”这种间接手段来争取。这是

一些在自我认同的困境中挣扎的底层形象,他们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漂浮的身份,膜拜于自己的身份乌托邦。

并不是所有的“底层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无限认同城市,城市的“丛林法则”也让主人公们经历了一次次残酷的现代性“洗礼”。陈应松的《太平狗》中的人与狗在城市里被层层堆积的苦难压榨得血肉模糊;《问苍茫》中柳叶叶怀着对城市繁华的美好幻想,最终在不法企业家的无情和狡诈中觉醒。但“底层文学”作品并不完全是反现代化,而将城市与农村绝对地对立起来。在温情叙事作品《遍地青菜》、《白莲浦》中就探寻了二者融合的可能,虽然这种融合有时带有一种想象式的美好。“底层小说”作家的批判立场指向的是社会中反市场的丑恶力量,像《问苍茫》中钻新劳动法的空子来避免工伤赔偿的行为,极个别政府官员片面追求和谐稳定而压制民怨的行为等。现代性残酷的洗礼在“底层小说”中广泛存在着,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平台——该追问谁的过失,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底层弱势群体难以享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爱情叙事:焦虑的缓解

在打工生活中,并不是只有焦虑、消极的暗影。工人们可以随时面对死亡以及肉体、精神上的折磨,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着温柔和包容一切的爱。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亲情、友情,在几乎每一篇“底层文学”作品中都包含着爱情叙事。与其他作品相比,“底层文学”中的爱情没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戏剧性情节,常常以委婉动人的柔情或是淡淡的无奈来渲染。在刘庆邦的《心事》中,矿工慧生哪怕被开除矿籍也不愿所疼爱的妻子当众检讨而受委屈,“天下就属挖煤的最心疼女人”^[6]点出了底层工人们的心声。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中书写了在物质贫乏中底层人群的爱情经验:“林秀珊和王锐并不是每周都能见上一面,但他们每周都会通上一个电话。三年来一直如此,风雨不误。林秀珊住的集体宿舍和王锐所住的工棚都没有电话,他们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各自居所附近的一部公用电话当自家电话来用。现在电信业很发达,城市的街道上遍布着话亭,你只需买一张IC卡就行。这些电话亭大都披挂着一个苹果绿色的罩子,人站在其中,就像是被它给揽在怀中了,所以林秀珊有时觉得电话亭是个情种。”“等有一天发了横财,买个最好的口琴,我用

它当闹钟,天天早晨用琴声叫醒你!”没有手机,为省钱坐火车中的“慢车”,这些对于“城市人群”已经有些陌生的生活片段,带着苦涩的诗意充满着一种超越苦难的力量。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工作脏乱和危险,使得底层的人们更懂得珍惜。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物质条件之下,爱情赋予了他们几乎所有的精神慰藉和支持。“底层小说”的爱情叙事中虽然还有小部分作品存在着才子佳人式的叙述模式,但大多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在日常被我们无意识地漠视和忽略的命题——底层之爱。黄平在《<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中谈及:“充满血腥、残酷、牺牲、身心摧残的小说的《太平狗》先后获得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读者投票)等多个奖项,被传媒指认为‘底层叙事’和‘打工文学’的代表作”,由此对“底层”的主流想象可想而知。“苦难”、“吃饱饭”是人们对于底层人群的首要标签,而这些被侮辱与被受害者的精神世界却始终处在无言的状态。当我们的眼睛总被消费主义和现代化带来的美好图景所吸引之时,“底层小说”通过爱情叙事把这些被忽略的历史真实地呈现出来,展示了一种受难中含情脉脉的美,爱情与苦难叙事相结合使得二者都被衬托得更鲜明。这种爱情叙事,使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增添一个维度。同时,爱情也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为充满苦难、贫困和屈辱的故事添加了一抹亮色和柔情,使得叙述有张有弛、刚柔并济。这种深刻而坚贞的爱同样也起到了反抗现代性的作用,即便在物质上、视野上,底层人群被认为是困窘或是“傻气”,但纯朴真挚的情感和崇高的爱情是没有等级的。正如《踏着月光的行板》中的夫妻在假期奔向对方却一次次在慢车上错过的情节,颇似欧亨利书写的《麦琪的礼物》——同样的底层,同样的卑微,但爱情永不卑贱。

底层人的爱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爱情的艰难或是屈辱给底层人民的生活抹上了更加沉重的底色。除了恋爱过程的艰难和生活的困苦,在“底层小说”中,爱情的对象——女性常常被设置成为一个受难者的形象,通过肉体的失落来彰显苦难的深刻。如胡学文《命案高悬》写出了农村基层权力的运行当中的一个黑幕,一个女人的死就好像被抹掉的一粒灰尘般微不足道,真相永远无法探寻。曹征路的《问苍茫》里的毛妹为抢救工厂财产去扑火而毁容,却被当作利用自己青春容貌做筹码来诈骗钱财。曹征路《那儿》里的杜月梅:“这个女人从前

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单纯,跟在他后面师傅师傅地叫着,咯咯咯地笑着,如今为了三十块五十块就能随便跟人睡一下!她没有法子,因为她还是个母亲,她还有一个住在医院里的孩子。”女性用肉体承担苦难,成为小说中一道凄楚的风景。

“妓女”形象常常出现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作家笔下有着不同的意义。郁达夫用笔下的可怜无助的妓女来表达自我的命运多舛的孤苦;沈从文笔下善良的边城妓女与纯美的湘西风景共建了“人性的小庙”;而在“底层文学”里,作家通过妓女的形象来演绎苦难,表达自己对民族现代性的思考。《高兴》里的孟夷纯用卖淫辛苦赚下的几万块钱汇给公安局办案擒拿杀人凶手,却被公安局里个别人吃喝玩乐消费光了。《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磨刀人一家被生活所逼,迫使妻子出去卖淫。“我们从青楼里去看经济,经济中的龌龊就显现得更加清晰”,“在现代思想的观照下,人们对于卖淫现象不再是单向地从道德观出发作出价值裁决,而是将其视为政治、经济、生理诸方面的综合性的产物。”^[7]《高兴》中地位低贱的妓女与国家机关干部,守卫亲情的动机和法律名义下的谎言之间,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孟夷纯如佛妓般为了捍卫亲人和公平顺从污浊的比照下,极个别地方当权者的丑恶嘴脸显得那么的猥琐和阴暗。同时,在考察作品时候,“既要看到因政治事件、政策、商品刺激引起急剧变化的短时效的易变因素,同时看到人文环境、思维方式、情感方面等等相对稳定的深层因素。”^[8]从历史的纵深方面考量,从古到今对于妓女主题长久的书写当中,有关妓女身不由己的苦难身世的例子数不胜数,“底层小说”在情节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是,就在这历史的发展变动与情节的“不变”当中,就在底层女性的命运和道路的选择中,我们不难看到:在社会进步的大潮之中,仍然有一部分死角是现代性不能照耀到的停滞的角落,是社会的一块黑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书写底层“可以原谅的堕落”或者“英雄救美”的作家们在以底层女性为写作对象时,一方面无法规避根深蒂固的男权心态,将自己所“肯定”的妓女角色设置为因悲惨身世而无奈堕落,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情节设置也是他们赞扬底层中的牺牲精神、坚强品格等美好品质的意图体现。这相对于那些为人性解放开空头支票的作家,他们的叙写道德立场显得更加善良。

三、结语:“底层文学”的意义和出路

雷达在评论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时提到:“作家的任务不是为历史或现实编制目录。问题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真正揭示出时代渗透于人的深度,能否从人物的命运和选择中融化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要同时对历史和时代负责,甚至能前瞻性地发现社会的潜在危机。“底层文学”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农村转型期产生的“城市边缘人”,努力表达了他们被忽略的生活焦虑感、自我身份认同的困难,以及在表象下内心情感的追问。同时,爱情叙事也成为苦难表达的一个载体,成为反抗现代性的策略。在底层人的焦虑和爱情里,我们读到了源于底层自身的感觉体验和心理认知:软弱、坚强、崇高、苦痛、焦虑;而不是先验的标签:“底层——苦难——可怜”。这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下对个体生存经验的尊重。无论作品的写作者是来自底层或是知识分子,既然理念上真正意义“底层的声音”是无法寻求的,那么可以把知识分子的代言当作一种策略,是借助“他者”的体系来展示自己,追求底层自我表述与知识分子表述两种方式的良性沟通。

同时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底层经验言说当中,作家常常成为苦难或温情叙事的“新闻记者”,而无法像五四时期的作家那样拥有某种社会理念做后盾。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一书中将作家针砭时事、反映疾苦的写作行为作了本质上的区分——进行“批判性”思考或是表达“怨恨”。^[9]

作家以及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认同焦虑质感即类似于“怨恨”这种现代性情绪,仅仅只是感性地对他人境遇的打抱不平而发出声音。假如作品仅仅是试图代表社会弱势群体表达这种焦虑和痛苦,期待通过知识分子的诉求来改变底层人群的处境,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底层写作者丧失了自己的评价立场,也不需要立场,它只需要反映现象就足够了。此外,反思近几年“底层文学热”我们可以得出:仅有“趁着政治的热度打苦难的铁”这种政治维度的关怀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如巴金《寒夜》、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般的人道主义的底层情怀。在这个解构主义盛行的年代,知识分子并未规避良知和责任感的呼唤,而是投身于描写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事业当中,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从文化层面上看,他们的写作意义在于通过底层这一现代性的裂隙,唤起人们对于意识形态制造的美好图景的重新审视,探寻反思现代性的可能。

同时我们也期待,“底层”能够努力争取自我言说的空间,以便自主地表述爱情、恐惧、焦虑等现代性情绪。就如同美国的黑人一样,虽然面对白人精英文化他们是弱势群体,但他们的音乐却成为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或许只有这样,“底层文学”才能真正成为“底层”的文学。

[参考文献]

- [1] 旷新年,王向阳.镀金时代的文学[J].读书,2009(6):138.
- [2] 贾平凹.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8.
- [3] 王十月.开冲床的人[J].北京文学,2009(2):79.
- [4] 曹征路.问苍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82.

- [5]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6.
- [6] 刘庆邦.民间[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91.
- [7] 贺绍俊.我们从“青楼”里看到了什么[J].小说评论,2005(6):7-12.
- [8] 雷达.诗与史的恢宏画卷[A].路遥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323-332.
- [9]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12.

(责任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Identity Approval and Love Narration ——Two Keywords of Current “Grassroots Novels”

CHEN She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Confronting the era of change in rural economy and problem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the writers of the grassroots novels acutely grasp the ideological statu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n make artistic response to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y. In this paper, the two keywords of “Identity Approval” and “Love Narration”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anxiety feelings of the inward world of grassroots people and their identity approval crisis based on their living experience between rural – urban areas, however, the grassroots novels use the strategy of love narration to mitigate the anxiety of the identity of the protagonists.

Key words: grassroots novel; identity approval; love narration; modernity

高校流行文学书籍读者阅读倾向分析*

舒小军

(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重庆 400067)

[摘要]图书是高校学生重要的学习资源。学生阅读图书的质量、广度等都直接影响学生知识结构的形成,特别是文学类图书,是学生课余娱乐的主要方式。本文列举大量数据,分析高校学生的阅读倾向及形成这些倾向的原因,分析影响学生阅读的心理因素等。

[关键词]校园;文学;书籍;阅读倾向

[中图分类号]G252.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0)06-0142-03

在高校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中,文学类书籍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类目,它几乎是所有读者都需要的文献资料,能占到全年图书流通量的30%左右。这些文学类书籍对于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作用。

高校图书馆的文学书籍储备结构为:小说+情感小品+诗词歌赋和文学理论书籍。前两种的借阅量比较大,第三种却少有人问津。虽然在有文科专业高校馆这些书籍可能是收藏的重点和特色,但流通数据却越来越不容乐观。在这些图书馆里,它必须存在,却少有需求,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学生的阅读方式,需要沉心静气来阅读的书不再受学生的青睐,诸如《诗经》《诗品》《历代文学评论》《人间词话》等在上个世纪的文科大学生中曾经一书难求,如今却无人问津。那么到底学生们喜爱哪些作家,哪些作品?他们的阅读倾向由何而形成?

一、校园读者喜爱的作家

据四川大学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读者最喜爱的作家有鲁迅、余秋雨等等,但奇怪的是,鲁迅的作品却鲜有人读,而余秋雨等作家虽然有一定的读者群,也远远还没有达到追捧的地步。也许鲁迅的作品太过艰深晦涩,离这个时代又太过遥远,而他的名字和作品又伴随我们整个中学教育,以至在读者的脑海里打上深深的烙印。多数读者并不熟悉,也不喜欢鲁迅的作品,但是他们熟悉那个印在木刻画

里的那个目光犀利、不畏强权的斗士,与其说鲁迅等作家最受读者喜爱,不如说读者已经把他们当做一种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这种符号可以显示读者认为自己比较正面的价值观,因此声称自己最喜爱他们。

从图书馆借阅的数据来看,真正被读者追捧的大多是新生代作家,他们是本土原创文学的代表人物,如饶雪漫、郭敬明、韩寒、沧月等。由“新概念”作文比赛中脱颖而出,并且一举成名的郭敬明,现在是国内青春文学的掌门人,其代表作品《幻城》曾多次再版,一度成为青少年读者的最爱。他以及旗下的写手,已经成了畅销书的代名词。

台湾作家在校园里也比较受欢迎,特别是受到女性读者的欢迎,这也许跟台湾文学的作品风格有关。三十年前琼瑶曾经是言情小说之王,现今的代表作家是张小娴、张曼娟、林清玄等,他们的作品清新温婉、情节浪漫简单,迎合了女生向往爱情的心理,一向被单纯、爱幻想的小女生所喜爱。

二、读者最喜爱的文学作品类型

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里面,文学书籍被分类为文学作品集及它们的评论和研究,其中小说的分类较为细化,有情感、社会、历史、武侠等。随着网络文学的盛行,文学书籍的种类更丰富了,譬如悬疑惊悚、玄幻魔法、现代言情、时空穿越、科学幻想、历史、武侠、诗歌小品散文等,中图分类法虽然尚未采用这种分类方法,但在各大文学网站,

* [收稿日期]2010-07-10

[作者简介]舒小军,女,重庆人;馆员,在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工作。